

崔卫平

本文作者崔卫平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文学理论和当代东欧思想文化，曾翻译过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著作。

# “平行城邦”： 捷克斯洛伐克 反对运动的 经验

**摘要:** 极权统治下是否有可能反抗以及如何反抗? 当年捷克斯洛伐克异议者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建构“平行城邦”或者说“平行结构”。什么是“平行城邦”? 它的含义是否如同人们一望即知的意思? 它是如何成为一种可以辨析和生长的思想, 进而对民主转型有意义的? 本文拟探讨这些问题。

## 一、引子: 寻找反抗极权主义的思想资源

### 回到哈维尔

2017年2月8日,《纽约客》发表印度政治评论家和小说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文章《瓦茨拉夫·哈维尔关于如何创建一个“平行城邦”的经验》<sup>1</sup>, 其中将哈维尔视为当今世界反抗极权主义的思想资源。米什拉的这个看法超越了许多人——当年作为持异见者的哈维尔, 远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世界“遥远的怜悯和同情的对象”; 哈维尔所批判的极权主义不仅限于共产政权, 而且将西方世界的弊病也囊括在内。在由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的匿名统治、消费主义、技术操纵等所构成的西方社会里, 虽然在物质上更加成功, 但是人们仍然感到深刻的无力感, 感到自身真实人性和责任感受到了压制。

的确, 在米什拉提到的哈维尔写于1984年的文章《政治与良心》中, 哈维尔把极权主义视为全球性现象, 认为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 ……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来自危险的邻国, 更不是什么世界进步的先驱。正好相反: 它们是这个文明的全球危机的‘先兆’。”<sup>2</sup>

2016年川普的当选看上去坐实了哈维尔三十年前的警告。一个满口谎言的家伙被推到了前台, 而许多人们仿佛不在乎真相, 对基本事实缺乏兴趣, 令

太多的人感到失望和无力。川普在台上至少有四年，怎么办？米什拉想到了在他看来是哈维尔推荐的方案：建立一个‘知情的、非官僚的、动态的和开放的社区，构成‘平行城邦’”。不同于压迫性政权和谎言社会，在这样一个民间组织起来的地方，人们得以恢复“信任、开放、责任、团结和爱。”米什拉认为哈维尔从中看到了某种“救赎的可能性”。

2019年1月，澳大利亚邦德大学丹尼尔·布伦南 (Daniel Brennan) 发表文章《在川普的年代读哈维尔》，<sup>3</sup>针对米什拉文章中的观点提出了反驳。针对米什拉关于“救赎”的说法，布伦南指出，哈维尔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没有推荐一种“救世”方案，他始终对于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结构采取犹疑的态度，对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思路保持终生警惕，哈维尔天生是反乌托邦和反弥赛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的极权主义的分析才同时适用于共产政权和西方世界。

## 异见地下社会？

在表达对于救世主的期待十分渺茫的同时，哈维尔关心什么？布伦南的分析到位：哈维尔感兴趣的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如何说服个人采取违背自己道德直觉的行为，从而倡导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人反思和个人责任，即每个人需要问自己，他们的行为对于有害社会状况的产生或维持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并非想要一个与权力相平行的异见地下社会，而是倡导人们“在阳光下改变个人行为”。这些都抓住了哈维尔思想的根本。难能可贵的是，布伦南对于哈维尔这个人的气质把握十分准确，他指出哈维尔多次谈到自己的脆弱乃至缺陷，无意把自己说成“英雄”，在他揭示自身人性复杂性的同时，也在提醒其他人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才是今天政治的基

础。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也决定了今天反抗的条件——如果不存在或无法依赖一种殉道英雄的伟大姿态，那么人们该怎么做？

关于“平行城邦”，布伦南文中仅说了一句“哈维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想法，但最终拒绝了这一想法，声称不要逃避任何政治现实”。在他的这个上下文中，似乎潜藏着一种理解，“平行城邦”有可能脱离当下现实？它符合哈维尔的原意吗？是否围绕着“平行城邦”，有过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平行城邦”是否如同人们一望即知的含义？本文拟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写作本文并不是因为美国政治。

## 个人责任与集体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本人不同意布伦南文章中的这句“哈维尔倡导的是个人责任，而不是集体组织的对政权的抵抗”，他把事情说得有点绝对了。2009年3月份，学者徐友渔、律师莫少平与我本人在布拉格与哈维尔见面时，哈维尔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零八宪章》之后的处境，我介绍自己说一连写了5篇文章，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山鲁佐德，给吃人怪物连续讲故事，以免马上被吞掉，哈维尔沉吟了一下，答道：“仅仅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集体的行动”。其中后半句的措辞是通过翻译及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哈维尔想要纠正我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意图，是十分鲜明的。

## 二、从本达到哈维尔：“平行城邦”思想的产生

### 海达内克：“广义的政治”

“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瓦茨拉夫·本达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介绍本达之前,我想先提到另外一个人——哲学家拉迪斯拉夫·海达内克(Ladislav Hejdínek, 1927-2020)。在我的阅读中,海达内克是第一个在这条思路上使用“城邦”(Polis)这个词的人,他试图发展《七七宪章》的另一一些面向。哈维尔1988年与他人的长篇对话、中文译成《哈维尔自传》中曾经提到过这位海达内克,1976年秋天官方审判地下音乐人之后,为了保存庭审抗议所积聚的能量,人们打算弄一个平台或宣言,为此哈维尔前往拜访了海达内克,海达内克提醒哈维尔这份将诞生的宣言“可以以不久前颁布的人权条约为基础”。<sup>4</sup>1968年海达内克曾在扬·帕托切克(Jan Patočka, 1909-1977)的推荐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所短期任职,与许多反对入侵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很快被革职,此时是一名锅炉工并在家庭大学教授哲学。

海达内克是《七七宪章》的第一批签署者和第二任发言人。他从1977年2月(《七七宪章》发布不久)到这年9月,给一位始终没有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写了21封信。在第六封信中(署期为1977年3月19日),哲学家先是解释了自己没有及时回复的原因是警方阻止他参加帕托切克的葬礼,而提前将他弄到一个地方关押了两天,接下来海达内克引进了“社区”这个词,并说“社区的希腊语是polis”<sup>5</sup>。海达内克区分了“广义的政治”和“狭义的政治”,“社区”和“城邦”则属于广义的政治范围,在这里即使一个非政治的人所做的事情也具有政治意义,比如一个人从事某种研究、写作或艺术创作的方式,都在为他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做出贡献。鉴于共产政权的经验,海达内克反对过度政治化,但是他不同意抹去政治。他说:“无政治或非政治是某种类型的政治,如果它成为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就会成为一种非常有害和危险的类型。”<sup>6</sup>

海达内克说得比较含蓄,但若是结合后来本达在“城邦”问题上的发挥,可以视海达内克想部分修订他的老师帕托切克强调《七七宪章》主要是一个道德行为而不是政治活动的观点。1977年1月8日,在《七七宪章》公布及哈维尔一行人被捕之后的两天,“宪章”第一任发言人的帕托切克写了《七七宪章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文章,奠定了宪章的道德基础。两个月之后帕托切克的突然去世,更是给宪章抹上一道殉道色彩。海达内克开拓了社区/城邦的面向,其意义在于:道德关乎个人,成就在个人,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属于垂直方向上的;“城邦”关乎与你一道生活的人,福祉在他人和社会,属于与他人共在的水平方向上。

## 本达: 平行结构

本达的《平行城邦》(*The Parallel Polis*)发表于1978年6月下旬的地下出版物《宪章通讯》。本达1946年生,1970年获查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校园生活的最后两年正值“布拉格之春”。他组建和领导了第一个独立学生协会,并活跃于一个天主教青年团体。1970年因其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起诉。他也参加了声援地下音乐人的活动,但他并不是《七七宪章》第一批签署者,因为他在布拉格市中心广场附近的公寓是一个经常聚会的场所,暂时还没有遭到破坏。1977年1月中旬,针对签名者的迫害铺天盖地而来,他立即签下自己的名字。

本达称这是一篇“急就章”的文章,起因于他要参加一次《七七宪章》“智囊团”的小型会议,与会要求里有提供一份书面发言报告,到现场时本达发现只有自己这样做了。本达回忆,这次会议召开时,《七七宪章》正处于某次危机之中。自“宪章”诞生一年半以来,这种危机经常发生,除包括帕托切克的

去世，还有签署者的再三被捕及流亡等。在本达看来，危机源自“宪章”本身——的确官方仅仅是拿法律（包括它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当挡箭牌，而“宪章派”却假装相信连官方都不相信的东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当然，通过自身的道德立场和伦理态度，宪章派至少暂时弥合了某种分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实际上，最初签署宪章的行为带来的欣喜若狂的解放感，逐渐让位于幻灭感和深深的怀疑，一种几乎是自杀性的道德冲动，并不能唤起更多普通人的支持。

本达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把在海达内克那里已经出现过的“城邦”朝前推进了，他以“平行城邦”作为自己这篇文章的标题。用在这里，希腊语“Polis”这个词强调有着自身起点的公民与他人的关联，和有主体身份的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本达的“平行”，即平行于官方主导的权力及社会机构。这个立场中所埋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指望能够改变官方的现有权力及其掌握的社会机构，但是可以在它之外创造出另外一些必须的社会功能，与之相平行，用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本达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缓慢而坚定地创建平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s），这些结构至少在有限程度上能够补充现有结构中缺少的普遍有益和必要的功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现有结构，使其人性化。”<sup>7</sup>

注意，本达迅速地用“平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s）来阐释“平行城邦”，觉得这两个字之间是可以替换的，在文章的主体行文中也是如此。这更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平行城邦”这个词的含义，即也可以理解为“平行的社会结构”或“平行社会”。

本达列举了着眼于“平行结构”可以拓展的范围，包括：法律、文化、教育、

学术、信息网络、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宗教。其中“文化”、“教育”和“信息”最容易理解，它们事实上已经存在，地下音乐的发言人伊万·希罗斯 (Ivan Jirous, 1944—2011) 已经用“第二文化”为此命名。希罗斯并辨析了共产政权下的“第二文化”与西方不同之处：在西方，“第二文化”有可能被第一文化收买和吞噬即商业化，而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环境里，“第二文化”将始终独立于任何官方交流渠道及社会认可的价值等级。希罗斯在1976年9月对地下音乐人的审判中被判18个月的刑期。本达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服刑。本达继承了希罗斯的精神，称“第二文化是最发达和最有活力的平行结构。它应该成为其他领域的典范”，比如地下出版 (Samizdat)、地下音乐、家庭大学等都是。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本达用了“ghetto”这个词，它包含了少数人的“聚集区”、“贫民窟”、“与世隔离”、“封闭”等多重含义，本达的用意很清楚：他希望《七七宪章》能够有一个超越个人道德、牺牲及少数人俱乐部的视野，从自身走出来，拥有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结尾处本达写道：“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消除普遍的徒劳和无望的感觉，而不是助长这种感觉，我们必须努力从我们与该政权进行对话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可以说，本达的智慧在于阐述了一种后帕托切克的异议观点，这种观点将重心从个人道德及牺牲，转移到共同体的生活及社会结构。的确，反对活动所追求的，不应仅仅是牺牲在自己的活动之中，而是能够生活于自身活动之中并加以拓展，着眼于自身活动所带来社会的收获和社会的赢面，说到底还是让社会赢、成全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

## 哈维尔：小社会与大社会

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写于同年(1978)早些时候。在这篇长文中，哈维



尔对于本达“平行城邦”给与了热烈的支持。他表示，本达所提出的发展“平行结构”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阶段”。<sup>8</sup>哈维尔也是交替使用“平行城邦”和“平行结构”这两个概念，同时也运用“独立的社会生活” (independent life of society) 和“社会的自我组织” (social self-organization) 来称呼它们。然而哈维尔仍然强调它们的“非政治”性质，指出其“原本起源于政治之前的领域。……并非先验地产生于革新制度的理论当中，而来自生活的目标和真实的人们、真实的需要”。<sup>9</sup>此时的哈维尔，仿佛对于“政治”有着某种避而远之的洁癖。然而，仔细阅读哈维尔的行文，他也并非仅仅强调个人道德及牺牲，而同样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着眼于个人在“城邦” (Polis) 生活中的角色、意义，他提倡的是人们生活在“城邦生活”的真实中，对于城邦生活承担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哈维尔又进一步指出，意识到平行城邦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彻底摆脱主导社会，撤回到一个隔绝的和封闭的状态 (a retreat into a ghetto and an act of isolation)。如果说平行城邦造成一个小社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与大社会脱钩。实际上这种脱钩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会在这里或那里与官方结构发生关系，正像哈维尔所举例的，人们总要在国营商店购物、使用官方货币和遵守官方的法律。他不无讥讽地说道：“人们自然可以在基层的平行城邦过一种有声有色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如果刻意为之，以此作为一个专项，那岂不是另一个版本的精神分裂的生活在谎言中？”<sup>10</sup>哈维尔还提到了西方青年到印度寺庙遁入空门，认为这是逃避社会责任的做法。

### 三、10年之后：“平行城邦”的生长变化

#### 辨析和生长

与本达一样，哈维尔也运用了“ghetto”这个词。本达担心反对派以个人的道德理由（殉道）而陷入与世隔离的状态，哈维尔担心即使是“平行城邦”本身，也可能因为““另作一处”，而造成新的封闭和隔绝，变成一种自作自划、画地为牢的区域，除非“平行城邦”也能够“为了整体”（for the whole）而超越自身视野。可以说，是哈维尔最先揭示了“平行城邦”中所包含的张力，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辨析和生长的概念。

下面我将提供围绕着这个议题的一个切片，就近观看由此而产生的生长变化。因为语境不同，讨论的概念略有变化，但仍然指向同样的问题。

## 斯基林问卷

1986年到1987年间，加拿大历史学家斯基林（H.Gordon Skilling）为了写作他的《地下出版物和中东欧的独立社会》一书（1989），以“独立社会”的名义，向多位捷克斯洛伐克异见者发起了问询，一份问卷四个问题：

1. 你认为“独立社会”一词在贵国目前的条件下是否具有相关性和意义？
2. 如果是的话，你认为“独立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哪些？
3. 如此构想独立活动和组织其直接目标是什么？
4. 这样一个独立社会的长期影响和可能结果是什么？<sup>11</sup>

斯基林先是将其中七人的回复发表在美国《社会研究》杂志上面（1988），其中有希罗斯、本达、哈维尔、拉迪斯拉夫·海达内克和伊日·迪恩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 1937-2011）等人，取标题为《平行城邦或中东欧的独立社会：一项调查》（*Parallel Polis, or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Inquiry*）。1991年，斯基林和资深捷克语翻译家保罗·威

尔逊一道,出版了单行本《中欧的公民自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声音》,其中公布了18个人对这四个问题的回复,其中大多数是《七七宪章》签署者,还有几位天主教徒。

## 独立社会

时隔近十年,“第二文化”的创始人希罗斯对于“独立社会”这个概念反应最积极。希罗斯继续强调自发起点,称“建立一个独立的或替代的或平行的社区,是唯一有尊严的解决方案,因为权力剥夺了那些不参与其中的人的尊严。”<sup>12</sup>希罗斯的立场,符合他作为先锋文化人的身份,拒绝所有组织或准组织活动。即使在西方,他也同样会是那种孤傲脱俗、独来独往的人,虽然他在1978年出狱之后也签署了《七七宪章》。

另一位佚名作者也认为“独立社会”,是分析极权主义社会的基本概念,因为在共产极权中,任何存在于人们自己身上的东西,都不被认为是天然的、正常的和人类的,因此哪里有自发性、哪里就有独立性。独立社会“是政治的,不是因为它为自己寻求权力,而是因为它限制了极权主义的权力。”<sup>13</sup>在这个意义上,独立社会无疑值得高度肯定——它的确是被极权官方“挤”出来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面向上的努力有着广阔的前景。

## 平行结构与个人反抗

在本达看来,自他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最初任何乐观的估计,本达进一步指出平行结构与个人生命的反抗不同,个人的反抗是一簇鲜花,生长在一个不经意地避开极权主义杀戮之风的地方,然而当这些

风向改变时很容易被摧毁。后者是一条壕沟，它的存在取决于极权国家有计划地加以摧毁：而在时间和手段允许的情况下，只有一定数量的战壕可以被消灭。<sup>14</sup>

然而归根结底，本达与大多数这批答卷者一样，认为“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即不能停留于与官方之间的表面断裂和对立。尤其是考虑到完全脱钩不可能（哈维尔再次阐发了他的反乌托邦立场），更不能沾沾自喜、以自身作为衡量事情的尺度，包括不能把“独立社区”视为一个“受迫害社区”而陷入愤世嫉俗或自我怜悯。即使官方千方百计驱逐独立活动，但是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们不能继而认为自己恰恰是处在某个边缘，以小圈子的身份和口吻出现在公众面前。相反，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需要与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拥有更加宏大和长远的目标。正如海达内克所说：“自由和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每一次独立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接受更高的义务来证明其正当性。”<sup>15</sup> 什么是这个更高的义务和更有价值的东西？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的回答，正好是互相补充的。

本达强调，“平行城邦”这个方案有其优先考虑的内容，这便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保存或更新——以及维护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所依赖的所有价值、制度和物质条件。”<sup>16</sup> 着眼于民族共同体的前途，在本达看来，眼下“平行城邦”应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增长和更新，创造重新承担责任和同胞情感的纽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平行城邦”要为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提供政治燃料和雏形。在这个意义上，本达甚至不同意运用“地下”、“第二文化”、“独立文化”这样的概念，认为它们过分限于某些局部。1927年出生的心理学家雅罗斯拉夫·萨巴塔（Jaroslav Šabata），是1968年坦克苏军入侵之后第一批被重判的社会主义反对派（1971年获刑

7年半),前后三次担任《七七宪章》发言人(1978, 1981, 1986),他甚至认为可以不用“独立社会”这个概念,但是需要有一种独立倡议和活动(the independent initiatives and activities),“与社会民主化再生的深层过程相呼应,并能够作为更新的、普遍民主的先导。”<sup>17</sup>

## 多元化及开放社会

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及开放社会,也被认为是独立社会或平行城邦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米兰·希梅奇卡(Milan Simecka, 1930-1990)是来自斯洛伐克杰出的持异见者,1976年他的长文《秩序的恢复》描绘了进入1970年代之后所谓“正常化”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官方通过巧妙操纵个人利益而不是直接暴力,而实现新极权统治,被认为是与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相媲美的一部散文作品。“多元性”处于希梅奇卡表述的中心。他希望在独立活动中所树立的,正好是未来社会所期待的:“鼓励多元化的元素,提倡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宽容,反感和抵制意识形态思维和所有形式的暴力(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令这些品质在社会中牢固扎根。”<sup>18</sup>教育和历史学家拉迪姆·帕劳什(Radim Palouš, 1924-2015)为1982年《七七宪章》发言人,他呼吁当今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和生命相互依存的时代,因此,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们也要有“整体的和全球的”责任,对人类整体的存在包括地球及环境,抱有一种开放和对话的态度。

## 公民社会

当本达提出“平行城邦”时,“公民社会”的概念在这个地区尚未普及,那要等到1980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出现之后。此番回答斯基林的问卷时,已是80

年代后期,不止一位在他们的回复中,熟练地运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然而,对于公民社会的运用与西方有所区别。在西方,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在共产极权国家,第一,国家不履行其自身职责;第二,国家压制自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独立)社会里所做的工作及收获,其意义便不限于社会,不限于在社会领域中的工作及其意义,甚至也可以类比于在国家领域之内的工作及其意义。海达内克便指出,“社会要努力赢回其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社会将再次决定其国家将是什么样子”。<sup>19</sup>伊日·迪恩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 1937—2011)为1979年《七七宪章》发言人,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他说,当独立活动的人们寻求途径来实现被国家所忽视、压制的社会利益及需求时,“公民社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个国家”。<sup>20</sup>

## 价值观与道德问题

独立活动中的价值观为更多人关注和提及。在一个价值失范的社会里,独立或平行社会是培养正直、团结和宽容的天然形式,尤其是独立活动所释放的价值观——真理、自由、公正、人类尊严、文化记忆,这些都是人类活动的普遍保证。伊娃·坎特尔科娃(Eva Kantůrková, 1930—)是记者和电影编剧,1985年的《七七宪章》发言人,她倡导独立或平行文化重在创造普遍的文化意识,提供什么是卓越作品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并不专门属于某一方(独立的或官方的)。她也反对把不同区域绝对化,认为即使在国家电影厂或者小剧院,偶尔也会有某部优秀作品出现,但是由于在公共媒体上缺乏正当的批评讨论,社会公众便没有机会吸收和消化这部作品,它就会像深渊上空短暂停留之后,跌入价值垄断所造成的真空当中。也有宗教背景的人士对于独立文化(比如由希罗斯那样长头发的人所代表的)深表怀疑乃至拒斥,认为

它们代表了西方社会颓废放纵价值倾向，并不足取。宗教人士的观点来自基督教世界观。

彼得·皮塔特(Petr Pithart, 1941—)，多年为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作家、宪章签署者，1990年担任过捷克共和国总理。在他的回复中，涉及了对“独立社会”内部的批评。他认为如果缺乏真正的批评精神，官方与独立这两个领域就变得非常相似，同样是封闭的。比如就samizdat写作领域而言，有人把这种地下出版的形式本身即当作一种尺度，而不讲究质量和批评，结果可能出现许多业余的“书写狂热者”，然而却鲜见有价值的作品。这样，samizdat便会失去其读者。当然，皮塔特提醒道，任何批评都不能沦为人身攻击，而的确封闭或半封闭的区域，最容易滋生人身攻击的条件。在皮塔特看来，某些人从最初的道德神圣沦落为人身攻击，包括相信和传播各种阴谋论，这些行为“不自觉地助长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处的不道德状态”。<sup>21</sup>换句话说，这些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以其缺乏道德的行为，也会重新跌入他们从中独立出来的原先那个社会。

## 能量的积聚和爆发

哈维尔着力关注的是平行结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它们如何作为一个能量的积聚点和爆发点，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聚变。用他自己的特殊语言风格，哈维尔总是喜欢用“不确定”和“潜在性”这样的表述。尽管从目前或表面上看起来，持异见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群体，但是在他们周围，存在着一个潜在影响的广大领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这种影响就变得清晰可见。哈维尔这样说道——

“《宪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焦点，但这个焦点却不断地将独立辐射到其边界之外。很难说这种辐射正在和将要在被辐射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将诱发什么成熟或发酵（如果作为一种催化剂的话），以及这种辐射将对任何未来的社会运动有什么贡献。近年的波兰历史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KOR<sup>22</sup>及其活动家似乎无法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改变或影响总体社会状况。然后突然间，当公众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时，KOR的工作几乎在一夜之间便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KOR的最初的分析和理念性工作，一千万人的团结运动是如何产生的。”<sup>23</sup>

在哈维尔的头脑中，始终镌刻着一个“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时刻”。任何人都无法判断它什么时候到来，包括哈维尔本人也不做无谓的乐观估计。1989年1月份，他被捷共当局判了9个月监禁（5月份获释），这年9月份他在布拉格一家鱼餐馆回答记者时，说到希望变革来得快一点，但“我们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了”。<sup>24</sup>然而，几个月后的12月29日，哈维尔从这个“国家的敌人”一举转变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民主的前景和社会巨大的潜在能量就摆在那里！

当社会危机总爆发、旧秩序崩溃的时刻，需要有不同脉络和花式的网络，将这个社会托住和连接起来，让人们能够互相联系、互相看见，在混乱中找出方向、建立秩序和树立价值，不至于因混乱而陷入崩塌，遭受更大损失。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之所以相对成功，能够拥有一个和平的起点，是因为有比较发达的公民运动及公民团体；而罗马尼亚枪毙齐奥塞斯库则是一个转型的反面典型，那是一个最为缺乏公民运动的地方。

2023年2月



注释 .....

- 1 Pankaj Mishra: “Václav Havel’s Lessons on How to Create a ‘Parallel Polis’”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vaclav-havels-lessons-on-how-to-create-a-parallel-polis>. 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该文。
- 2 Vaclav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 259-260.
- 3 Daniel Brennan: “Reading Václav Havel in the Age of Trump”, *Critical Horizons*, Volume 20, 2019 - Issue 1, Pages 54-70 | Published online: 17 Jan 2019,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409917.2019.1563997?journalCode=yctrh20>. 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该文。
- 4 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 Translated by Paul Wils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90, 133.
- 5 海达内克第六封信 (1977 年 3 月 19 日) , <https://www.hejdanek.eu/Archive/Detail/884>
- 6 同上。
- 7 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Palgrave Macmillan, 1991.35—41, 下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该处。
- 8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Powerless”, 见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London: Faber & Faber, 1991)192.
- 9 同上 194。
- 10 同上 195。
- 11 H.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edited):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Voices from Czechoslovakia,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reface”, 10.
- 12 同上, 57。
- 13 同上, 44。
- 14 同上, 52。
- 15 同上, 64。
- 16 同上, 50。
- 17 同上, 100。
- 18 同上, 111。
- 19 同上, 65。
- 20 同上, 57。
- 21 同上, 92。

22 “KOR”1976年9月创立，被认为是波兰乃至东欧的第一个反对派民间组织，它的原名是“保卫工人委员会”，最初旨在为当年在拉多姆和华沙的抗议遭到报复而被捕的囚犯及家人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虽然KOR的成员先后遭到官方各种报复，然而他们的努力在第二年春天得到了回报——1977年春天，官方被迫大赦罢工的监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也由此更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

23 同前，62—63。

24 Michael Zantovsky, *Havel: A Life*, Grove Press, New York, 2014, 288.